

「他」，一個年青人，背起了背囊，乘火車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，然後，又回來了。

他顯然不能投入當地的生活，也沒有嘗試去投入的念頭。在離開的那一天，他還沒有弄清楚街道的名稱，也沒有因此而感到遺憾；找不到公園的入口不要緊，反正在路邊看一會書法展覽，也可以為他打發一點時間；早餐時刻到了，他想着的是在家裏吃的燒餅、豆漿、熱狗；他甚至不會像一般的旅客對異地的風物存着近乎迷信的傾慕。所以，別人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插花檀香扇子和石雕藝術，在他看來都是可笑的。他寧願買一些在香港舉皆是的飛機模型和砌圖遊戲。

這樣的態度和他的旅客身份很不相稱；更何況，他是一個年青人。

他有着驚人的觀察力。他會留意到火車上的少年的布衫都沒有鈕扣、沒有拉鍊；他會留意到母親手裏挽着香枝，小孩手裏握着風車。他並且可以準確的告訴你他在火車裏一連喝了七瓶汽水，然後花了二十分鐘才從火車上下來。他又會告訴你，他在商店打了三個轉才決定買下那八個木魚，並且，在他的旅行袋裏的是牙刷、牙膏、洗頭水、內衣、電筒。

一切都準確得近乎冷酷，使人不安起來。這個世界的一動一靜都似乎逃不過他的眼睛。他就站在那裏，觀察着、計算着，恰如躲在黑暗裏的一頭狡猾的貓。他並且不厭其煩地向你報告他所見到的一切。他的語調冷靜得令人震慄；他遙遠而又苛刻。

他似乎沒有想過去投入生活，或是投入人群之中。他始終小心翼翼地保守着和世界間的一段距離。這種心理狀態在他和阿田的關係中見得最清楚。

阿田不是作者的朋友。文中說他是作者「母親的朋友的親戚的兄弟」，這個關係遙遠得幾等於零。感情是談不上了，但既然事實上確有那麼一點兒的關係，便總得做人情上應做的一套。更何況，作者也希望阿田能作他的導遊，帶他去喝豆漿、看長頸鹿。所以，他便聽母親的囑咐，把一細「烏墨墨」的布送了給阿田。膠袋送出了，阿田回報以三斤荔枝和四個菠蘿。這似乎是報答多於自發的餽贈，因為作者很清楚的告訴我們：「

阿田『也』給了我兩個膠袋」。而作者的反應，也不見得快意。那四個菠蘿帶來的，不是夏日菠蘿園的清蔥，而是在球場上吃波餅的蹩扭聯想。把這本屬於大地的菠蘿和膠制的足球連在一起，多少是由於作者擺脫不了屬於自己的生活形態。但當他從這本能的反應中抽身出來時，卻見到阿田「誠懇的態度」。主觀的感覺終敵不過客觀的道德與人倫標準。看着看着，他就點了頭，把三斤荔枝和四個波餅的聯想，一併帶了回家。

作者與阿田間的關係就是在這種施與受上建立起來的，沒有激情，也沒有虧欠。正如後來阿田帶作者去看長頸鹿，又去看黑熊，「是因為」作者那鞋、羊毛外套、T恤等都送了給他。又如後來阿田再送來一袋菜乾、髮菜、及一隻大號砂鍋時，作者由於見到阿田「那誠懇、帶點怯意，充滿溫暖的臉」，便又答應「必定會好好地把這一切帶回家」。他並且激昂地說：如果在那個時刻，阿田要他拾一扇門回家，他便會立刻去拾。點頭是表示承諾，卻未必是自發的喜愛與選擇。片刻的衝動可以驅使我們去作任何瘋狂的事。在這時候，便連拾一扇門回家也都顯得理所當然了。

阿田的形象自始至終是模糊的。我們可以知道的，全都是透過作者對他的觀感得來。作者形容阿田的外貌時說，「阿田和我一般，也是黑頭髮、黑眼睛，也和一個四格子的樹窗差不多高。」作者眼裏的阿田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份子，沒有獨立的生命，自然也「活」不起來。而他對阿田的認識和感領，也只是停留在那把「誠懇的臉」上，沒有內心的探索。同時，他認為阿田送東西給他，純粹是禮尚往來。阿田的出發點是否如此，我們不得而知。我們可見的，卻是作者對阿田的感情是那麼蒼白。

阿田其實是作者和外世界間的一度橋。他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機會讓作者去認識這個陌生的城市，及城市裏的「人」。作者在這裏作了一個謹慎的選擇。他毫不猶豫的緊守那一個「我」，把它看作最大的財富。在離開之前，他發覺自己的口袋裏還有十五塊錢，便想起了別人給他的忠告：「他們說的，如果到了車站，口袋裏的錢都要拿出來換糖。」這個「他們」，相信是指城裏的人。一個冰冷的代名詞，輕描淡寫地，沒有感激，也沒有那種原始的血緣感情。作者決絕地把



也斯·范俊風合編

# 大拇指

小說選

梁秉鈞 莫美芳 王志清 陳啟敏 適然有明 葉輝容 正儀 惟得 凌冰 李孝聰 革革 思滋 蓬草 阮妙非 西西 小藍 吳煦 媛

自己和「他們」分割了。這在他來說，似乎是最自然不過的事，所以在百貨商店裏，有人圍着他看他腳上的流蘇時，他也沒有感到不安。他反而會想到利用自己的「特殊地位」，在購買燒餅時去搶先。後來，他並且把這種隔離的態度帶上了火車。

車上的少年都輕輕鬆鬆地左蹦右跳，見到作者那笨拙的樣子都禁不住笑了起來。他們的笑，顯然令得作者很不快意。「正是這個緣故，我在火車上不久即打開了腦袋朝裏面尋覓」。本能地，他撤退了，退回那個「我」裏，自負而又伶仃守着自己和「他們」間的一堵牆。火車到站了，少年、女孩、母親、年輕人都大夥兒擠了下車，鬧哄哄的遺下一個笨拙的他，擁抱着一些他不愛的髮菜、菜乾、荔枝，和一個孤獨的靈魂。

這個孤獨的靈魂若是活在對絕對的事物的追求裏，還有其生存的美與熱。可悲的是，作者對事與對物都抱着無可不可的消極態度，一如他對人、對地。他喜歡麵粉餅，但並不愛得甘願為購買麵粉餅而去排隊；糖是他「不怎麼喜歡的」，也就等於「不怎麼討厭」；他甚至連看書都只要求「看一陣」而已。起程時他帶的是母親要求他帶的烏墨墨的布；回來時他帶的是阿田要求他帶的土產。這樣的情節安排，顯然是有所指。這些，都只是一些明顯的例子，事實上，作者那毫不在乎，無所要求的語調，自始至終都貫徹着整個故事。

值得留意的，是作者回來時帶的八個木魚和一部攝影機。這兩種東西，才真正是他自己的選擇，阿田曾經送給作者一尾游泳的魚，他帶不走，卻帶走了八個沒有油漆的白木魚。他並且很詳盡的形容這八個大小不一的木魚。他們身上都有明朗的刀刻，這是作者所喜歡的，然而，木魚再美麗，仍只是一個空白的軀殼，不能像游泳的魚一般擺動。它身上的刀痕再深刻，也不是生活的痕跡。不去投入生命之中，便永遠只能擁抱一個生命的複製品。攝影機能攝取事物的外貌形象，卻攝不到生命的本身。那空白，一如八個沒有油漆的白木魚。

時間和空間的交疊是文中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。故事一開始，人群都下車了，作者在第一段裏把那情形交待得清楚，但到第二段提及自己時，時間和空間便開始失去了

中心點，而成了蒙太奇式的鏡頭組合。作者說：「在這節火車裏，我是走在最後的一個人，並不是因為我剛才一連喝了七瓶汽水的緣故。我幾花了二十分鐘，才從火車上下來。剛才我一直在火車上打開腦袋朝裏面尋……」這幾個句子雖然拼在一塊，卻沒有因緣的關係。他花了二十分鐘才從火車上下來，既不是因為他喝了七瓶汽水，也不是因為他忙於作幻想，答案其實穿插在整篇故事裏，要讀者左撿右拾才能拼成一個整體。當他站起來預備下車時，紙袋竟破了，袋裡的木魚都跌到地上。由於人擠，他便只好乾巴巴地等待（第三段）；後來，人群散去了，他低頭撿木魚，卻兩次撞痛了頭（第八段）；最後，他把木魚都掉到砂鍋裏，然後背起行李，預備下車。但甬道太窄，他穿不過，便把行李調整了一下，才從火車上下來（末二段）。如是，他一共花了二十分鐘。又例如在撿木魚的當兒，他會忽然告訴我們，他並沒有旅行袋，因為旅行袋已送了給阿田。而旅行袋裏的，是牙膏、牙刷、洗頭水、白花油等。這種蒙太奇式的鏡頭在故事裏屢次出現，使人想到了作者背上的那架攝影機。生活本來就是一個個的片段，是我們的「感覺」和「呼吸」把它串成了一齣活的電影。只有

毫不吝嗇地投入生命的人，才可觀賞生活的苦與樂，才可去「感覺」、去「接觸」，而這些，正是作者所欠缺的。

作者並沒有告訴我們他去的是甚麼地方，及為了甚麼而去。但從他乘的交通工具及對城市的描寫看來，不難令人覺得那個地方就是中國。從這一層面來看整個故事，可以把它解釋作一個香港青年回國內的經驗。生活形態的不同做成了作者和當地人思想上溝通的困難。沒有溝通，便沒有基礎去建立感情，而所謂「體內流着同一中華民族血統」的理想化激情，也就顯得遙遠而幼稚了。

但在這個香港青年的背後，我們隱約可以見到一個更深刻的影子。故事裏的主角使人想起了卡天下筆下的異鄉人，但比較起來，前者顯然更為悲哀。卡天下的寂寞靈魂至少懂得在無有之中掙扎，希望能尋出一些可以把握的真理。但故事中的這個「我」，卻是個對人、對事、對生命都無所追求的人。沒有期待，自然也沒有得失。所以他究竟去了甚麼地方，便顯得無關重要，而他的旅程，也只不過是一個異鄉人的一段生命歷程——那裏沒有時空，也沒有愛恨。

